

#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探析

王聪聪

**内容提要:**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动员传统工人阶级、失业人群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方面具有广泛的潜力,但由于激进左翼政党,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现代激进左翼和“红绿”政党等本身存在多样性和异质性,其核心选民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像北欧和西欧的一些“红绿”政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女性和年轻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很多制度性因素如政党制度、政党竞争,也影响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命运和政治走向。欧洲社会民主党、极右翼政党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部分选民群体上的趋同性,使后者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而激进左翼政党在争取中间阶层、高学历和年轻选民群体等方面,也受到绿党的影响。

**关键词:**欧洲 激进左翼政党 工人阶级 民粹主义 选举支持

“民粹主义”的盛行在多重维度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它与当前欧洲的大衰退密切相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危机重重的反映。缘起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欧洲各国经济状况恶化,更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一方面,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遭遇民众的“选举惩罚”;另一方面,危机也侵蚀着既有的政党政治体系,导致一些国家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变化甚至瓦解。<sup>①</sup>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极右翼政党)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多重危机下政治激进主义的强化。学界相关研究表明,欧洲极右翼政党不仅蚕食了主流政党的选票,也动摇了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生态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群体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极右翼政党、左翼阵营政党(社会民主党、绿党)又在多

<sup>①</sup>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S. Pappas ed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5, pp.1-5.

大程度上影响着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sup>①</sup>和政治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 一 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研究述评

本文所指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是在政治光谱中位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左边的政治力量,<sup>②</sup>包括保守和改革的共产党、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红绿”政党等。这些政党以实现社会正义与平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主要政治诉求,主张通过财富再分配、经济规划、集体所有制来实现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激进变革。就研究对象而言,本文主要聚焦西欧的激进左翼政党,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中东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政治影响力都相对有限或者发展不稳定。<sup>③</sup>

近十年来,无论是国家个案分析,还是跨国比较,学界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从选举政治的角度展开分析是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笔者认为,当下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影响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成绩的制度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二是影响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的个人因素。

卢克·马奇(Luke March)与夏洛特·罗默斯基兴(Charlotte Rommerskirchen)较早开启了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的跨国比较分析,并以“需求与供给”(demand and supply)理论模型作为切入点。他们认为,政党文化、失业率、疑欧主义、反全球化、选举门槛、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竞争等是影响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sup>④</sup>在他们看来,经济形势低迷、疑欧情绪高涨和激进左翼政党获胜的历史遗产等需求层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胜利;而供给层面的因素如较高的选举门槛、来自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的竞争等,则削弱了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乔治·哈拉兰波斯(Giorgos Charalambous)等人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政党竞争因

<sup>①</sup> 本文所阐释的“选举支持”,主要是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支持,一方面是指选民在年龄、学历、性别、职业等方面的群体性特征,即哪一类选民倾向于支持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另一方面是指政党的得票率,即除了选民个人因素外,其他制度性因素如欧洲社会民主党、绿党、极右翼政党等对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成败的影响。

<sup>②</sup> “欧洲激进左翼”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国内外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略有区别,参见 Luke March,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林德山:“欧洲左翼政党:概念、分类与结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7日;李其庆:“‘欧洲激进左翼’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sup>③</sup> 除了捷克的摩拉维亚与波西米亚共产党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外,中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后继党”要么缺席本国政坛,要么政治实力虚弱。

<sup>④</sup> March Luke and Rommerskirchen Charlotte, “Out of Left Field? Explaining the Variable Electoral Success of European Radical Left Parties”, *Party Politics*, Vol.21, No.1, 2015, pp.40-53.

素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绿党对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的影响。<sup>①</sup> 在政党生存所需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方面,马克·维瑟(Mark Visser)也基本认同马奇的观点,即在拥有威权主义政治遗产的国家,激进左翼政党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拥护。<sup>②</sup>

在影响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的个人因素变量研究方面,与维瑟等人所持的失业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最容易支持激进左翼政党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路易斯·拉米罗(Luis Ramiro)指出,高学历的人更倾向于支持激进左翼政党。通过“欧洲选举研究”(European Election Study)数据库对选民社会背景、政治态度的定量分析,拉米罗认为,工人阶级、工会成员、无宗教信仰者、左翼分子、反民主体制和对欧洲一体化持消极态度的人群更容易支持激进左翼政党,而他们正是各国激进左翼政党的核心选民。<sup>③</sup>另一些学者如劳尔·戈麦斯(Raul Gomez)、劳拉·莫拉莱斯(Laura Morales)等人则试图阐明激进左翼政党内部选民群体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他们认为,虽然“传统”和“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在年龄、性别、工会关系、社会阶级、居住场所等方面没有太大差别,但相对而言,“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的支持者中高学历和无宗教信仰者比例更高。<sup>④</sup>

总体而言,学界对影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的外部因素如经济社会条件、政党制度、政党竞争,内部因素如政党战略、政党遗产,以及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个人因素如政党认同、社会态度、受教育水平与工会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更多的是基于实证层面的量化分析。本文拟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总结新世纪以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民的基本特征,以进一步深化对激进左翼选举政治的认识;并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出发,阐明同在左翼阵营的激进左翼政党选民与社会民主党、绿党选民的异同,以及激进左翼政党选民支持与极右翼政党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进而分析政党竞争因素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率和政治走向的影响。

## 二 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特征

1967年,美国学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罗坎

<sup>①</sup> Giorgos Charalambous and Iasonas Lamprianou, "The (non) Particularities of West European Radical Left Party Supporters: Comparing Left Party Families Asona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 2015, pp.1-26.

<sup>②</sup> Mark Visser et al., "Support for Radical Left Ideologie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53, No.3, 2014, pp.541-558.

<sup>③</sup> Luis Ramiro, "Support for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cial Background, Ideolog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 No.1, 2016, pp.1-23.

<sup>④</sup> Raul Gomez, Laura Morales and Luis Ramiro, "Examining the Diversity of Radical Left Parties and Voter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9, No.2, 2016, pp.351-379.

(Stein Rokkan)提出的“社会分歧理论”(Cleavage Theory)认为,中心与边缘、国家与教会、资产者和无产者、土地和工业之间的分野决定了欧洲政党的出现及其政党纲领的差异性。<sup>①</sup> 社会分野将选民分为倡导者和反对者,并将选票投给相对应的政党。一些学者认为,虽然自由-保守主义分野(liberal-conservative dimension)在美国政治中日益重要,但在欧洲公众视野中,左-右维度(left-right dimension)提供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线索,因而一直是欧洲政治话语中一个稳定的要素。<sup>②</sup> 尽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导致“新政治”议题的涌现,但围绕经济议题的左右分歧依然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它建立在阶级分野(资产者与无产者)基础之上,以“社会平等”为主要划分尺度与标准。通常而言,左翼倡导社会平等,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包括通过公有制、经济计划以及再分配政策缩小社会差距,而右翼则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

西方社会民主党以及共产党(后来的激进左翼政党)是左翼政治的典型代表,也是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人阶级以及蓝领阶层的数量骤减,中产阶级成为最庞大的阶层。主流中左政党与中右政党为了扩大选民基础,纷纷进入了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变的发展阶段。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向“社会民主主义”调整即是重要例证。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共产党普遍经历了选举支持率的下滑。以法国共产党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共获得了20%的选票,而在1981年的国会选举中仅获得16.17%的选票,到1986年则下降到9.87%。苏东剧变后,伴随着欧洲许多共产党的“民主转型”与政党重组,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近年来,政党非意识形态化、政党形象中间化、政党象征个性化等选举政治新趋势正冲击着西方的选举政治生态。但相比较而言,欧洲选民拥有较为稳定的政党偏好。也就是说,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党认同,依然是影响欧洲民众投票行为的非常重要的变量。而这种建立在政党认同基础上的投票行为特点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而言尤其明显。在欧洲很多国家,激进左翼政党都将“维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作为政党的首要目标,而非选票最大化或职位最大化。特别是对于西欧传统共产党、中东欧共产党的后继政党来说,正是一批忠诚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选民的支持,才使得它们在冷战结束后风云诡谲的政治博弈中拥有一席之地。正如一些学者所指

<sup>①</sup>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ee Press, 1967, p.554.

<sup>②</sup> Ronald Inglehart and Hans Klingemann, “Party Identification, Ideological Preference and the Left-Right Dimension among Western mass Public”, in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e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London: Wiley, 1976, p.243.

出的：“左翼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被定义为左右分野的抽象思想，还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是关于市场和社会平等的具体议题——是后共产主义政党获得选举支持的关键要素。”<sup>①</sup>卢克·马奇也认为，那些长期拥有共产党、工会、左翼学生运动或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团体的活动经历，在意识形态方面强烈认同激进左翼政党的支持者或活动家等“激进左翼亚文化群体”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民的重要来源之一。<sup>②</sup>也就是说，共产党或其后继党的“红色纽带”团结了一批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诚的支持者。这也部分解释了一些“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如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虽未经历重大的组织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的调整却依然获得相对稳定的选民支持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地域、国家和政党的政治传统、现实基础、历史遗产、国内制度性因素的差别，激进左翼政党本身的多样性非常明显。它既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现代激进左翼政党，也包括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绿色替代”或“红绿”政党等。而这一多元化的政党图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相应的选民特征。从职业与教育背景、性别、年龄分布来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呈现出地域上的趋同性和差异性特征。

首先，从职业和教育背景来看，支持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群体主要由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阶级（蓝领工人）、失业与其他低收入人群，以及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中间阶层两大部分构成。总体而言，支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选民以工人阶级居多，而“新左翼”的激进左翼政党吸引了更多的中间阶层选民。这一特点在南欧地区的葡萄牙和希腊最为明显。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光谱中都存在两个激进左翼政党，却在政党传统、政策纲领、选民基础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例如，葡萄牙共产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地区的农民以及里斯本附近的工人，而葡萄牙左翼联盟的成员和选民受教育水平更高，主要为教师、律师、物理学家、艺术家以及高校职员等，该党也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政党。<sup>③</sup>它将自己定位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左翼阵营，试图将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与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以及反性别歧视相结合，因而获得了更多来自“新左翼”、左翼自由主义群体的支持。

<sup>①</sup> Timothy J.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②</sup> Luke March, *Contemporary Far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8, pp.10-12.

<sup>③</sup> Dominic Heilig, “The Portuguese Left: The Story Of A Separation”, in Birgit Daiber et al.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12, pp.247-248.



同样,希腊共产党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会成员,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拥有更加多元化、更具活力的社会阶层,特别是35-45岁之间的拥有高学历背景的人群。支持和强化“全体工人战斗阵线”工会(PAME)的活动是希腊共产党核心工作之一,PAME工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建筑、货运、纺织行业的工人和医院雇员等。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基本定位是“全方位政党”,其成员和支持者主要来自公共部门的高学历雇员、专业人士和中小企业家。<sup>①</sup>近年来,随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党的衰落,很多对PASOK感到失望的中产阶级选民、失业者和年轻人等转而支持激进左翼联盟。

核心选民特征的差异性,同样表现在特定地区的不同激进左翼政党之间。北欧地区的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红绿联盟”党、瑞典左翼党等政党的选民群体,主要来自公共部门,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例如,丹麦“红绿联盟”党最大的选举基地主要集中于哥本哈根,除了“新社会运动”一代人的支持外,还有很多年轻选民。<sup>②</sup>与老龄化特点更明显的工党相比,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超过一半的选民都是来自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雇员等。与北欧地区的其他“红绿”政党相比,芬兰左翼联盟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重要的政党纲领政策革新,制定了以社会正义、平等、可持续性为核心内容的“红绿未来”纲领,但该党的“旧政治”色彩依然浓重,吸引了更多蓝领工人特别是穷人、社会边缘性人群的支持,其中工人阶级占43%左右。

选民群体的分布差异,同样也表现在同一政党的不同选区之间。德国左翼党是政党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典型例证,该党甚至长时间被视为地区性政党。20世纪90年代,左翼党的前身——民社党(PDS)通过捍卫“东部德国人民的利益”,成功巩固了其在德国政坛的地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左翼党并未成功扎根于德国西部地区,大部分西部州的基层组织无论是在组织结构、物质基础,还是选举支持方面都相当虚弱。在全国大选或联邦州大选中,左翼党在东部六个州的得票率维持在20%左右,堪称第二大或第三大政党,有时甚至是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但在西部十个州,左翼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抗议性政党而存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同的制度性环境的影响,必然反映在其选民基础上。总体而言,作为代表社会正义的政党,德国左翼党在蓝领工人、退休人员、失业人群中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从德国2013年联邦大选结果来看(见表1),德国左翼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那些日益被挤出政治体系的人群:失业者、蓝

<sup>①</sup> Myr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 “The R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 Two Paths”,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18, No.1, 2013, pp.81-99.

<sup>②</sup> Inger V. Johansen, “The Left and Radical Left in Denmark”, in Birgit Daiber et al.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15.

领工人和退休人员等;其中,失业人群中 有 23% 的人支持左翼党,因此,失业者也成为该党最大的选民支持群体。从选民构成来看,左翼党在西部州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社会底层,以中低学历的中年男性居多,但该党在东部州则是全民党,选民群体更加均衡和多元。<sup>①</sup> 在东部地区,左翼党除了获得蓝领、失业者的支持外,其选民群体还涵盖了白领工人、公务员、自营职业者以及中上层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等。

表 1 2013 年德国联邦大选中各政党选民群体分布

职业	基督教民主联盟	社会民主党	自民党	左翼党	绿党	海盗党	选择党
所有	42%	26%	5%	8%	8%	2%	5%
蓝领工人	35%	27%	3%	13%	4%	4%	6%
白领工人	39%	26%	5%	8%	11%	3%	5%
自营业者	49%	14%	10%	6%	11%	2%	5%
退休人员	49%	28%	4%	8%	4%	0%	4%
失业者	24%	26%	4%	23%	8%	5%	3%

数据来源: Cornelia Hildebrandt, “A Political Earthquake in Germany: The Results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September 22”, *Transform*, 06.12.2013, <http://www.transform-network.net/en/publications/yearbook/article//a-political-earthquake-in-germany/>, 2017 年 5 月 22 日访问。

其次,从选民的性别构成来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群体也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北欧和部分南欧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的女性支持者远远高出其他地区。从 2004 年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见表 2),荷兰社会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瑞典左翼党等均获得将近 60% 的女性选民的支持。南欧地区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以及葡萄牙左翼联盟的女性选民比例也超过男性。而在德国、西班牙、希腊、法国等国家,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则以男性为主,其中法国共产党男性选民比例最高,将近 70%。另一方面,同一国家的不同激进左翼政党,在选民的性别构成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如葡萄牙左翼联盟的女性选民比例较高,而葡萄牙共产党则以男性选民为主。

虽然这一跨国比较数据并非最新统计(尤其考虑到希腊政治局势的变化),但它

<sup>①</sup> Cornelia Hildebrandt, “DIE LINKE in Germany”, in Cornelia Hildebrandt and Birgit Daiber eds., *The Left in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Alliances between Norway and Turkey*, Brussels: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09, pp.136-137.

从一个侧面说明,很多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已经不再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对女性主义的“新政治”议题的关注和强调,如男性与女性的同工同酬、政党组织中女性职位的增多等,使它们受到更多女性选民的青睐。吸纳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新政治”要素,是北欧地区激进左翼政党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政党变革的方向。例如,瑞典左翼党就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政党,女性主义是该党政治纲领的四大支柱之一,在该党组织机构中女性比例也相对较高。

表2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民性别比例构成(2004年)

国家	政党	女性(%)	男性(%)
荷兰	社会党	65.3	34.7
挪威	社会主义左翼党	59.6	40.4
瑞典	左翼党	59.0	41.0
丹麦	社会主义人民党	56.0	44.0
意大利	重建共产党	53.1	46.9
葡萄牙	左翼联盟	51.6	48.4
芬兰	左翼联盟	51.2	48.8
德国	左翼党	48.9	51.1
西班牙	联合左翼	41.5	58.5
希腊	共产党	41.5	58.5
葡萄牙	共产党	39.6	60.4
希腊	左翼运动生态联盟*	34.4	65.6
法国	共产党	28.6	71.4

数据来源: Dietmar Wittich, „Synopsis sozialer Umfelder ausgewählter europäischer Linksparteien“, in Michael Brie und Cornelia Hildebrandt eds., *Parteien und Bewegungen. DIE LINKE im Aufbruch*, Berlin 2006, S. 235.

注: \* 希腊左翼运动生态联盟(SYN)是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前身。

再次,在选民年龄分布方面,北欧地区激进左翼政党与荷兰社会党比其他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获得了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例如,相关研究表明,荷兰社会党最大的支持群体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其中25-34岁的选民占25%,45-54岁的选民占22%,



另外一部分支持者是 20 世纪的“新社会运动”一代人(1954-1964 年出生的群体)。<sup>①</sup> 北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选民“年轻化”趋势也比较明显,例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只有一小部分选民超过 60 岁,大部分支持者都为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而挪威工党则最受 50 岁左右选民欢迎。<sup>②</sup> 与其他北欧地区姐妹党相比,芬兰左翼联盟的选民老龄化现象更为明显,该党 50 岁以下的选民占五分之一左右,但近年来,该党也在逐渐吸引来自中间阶层以及年轻人的支持。<sup>③</sup> 大部分西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最核心的支持者,以 40-50 岁选民居多。例如,德国 2005 年全国大选、2008 年地方选举、2009 年地方以及全国大选的数据都表明,德国左翼党的主要支持者来自 45-59 岁的男性(工会)以及失业者。<sup>④</sup>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法国共产党 18-25 岁之间的选民比例相对稳定(3.5%左右),虽然该党拥有一批 45-55 岁的核心选民,但 65 岁以上的支持者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一部分选民正在老去。<sup>⑤</sup>

概括而言,基于欧洲激进左翼内部政党构成的多样性,其选民在职业与教育背景、性别、年龄分布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景。传统意义上以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政党形象,已不足以概括激进左翼政党的全貌。一方面,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南欧地区的共产党)依然属于“工人阶级”政党,其支持者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蓝领工人、失业者、退休者和工薪阶层为主;而另一方面,对于“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或“红绿”政党而言,其选民则更多地是由学历相对较高的公职人员、青年、自营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人群构成。这种选民特征的分野既存在于不同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也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激进左翼政党以及同一政党的不同基层组织中。

### 三 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左翼阵营政党之比较

在政党政治光谱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绿党都定位于政

<sup>①</sup> Clemens Wirries, “A Party for the ‘Simple People’: The Socialist Party of the Netherlands”, in Birgit Daiber et al.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p.158-159.

<sup>②</sup> Dag Seierstad, “The Left In Norway: Politics in a Centre-left Government”, in Birgit Daiber et al.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59.

<sup>③</sup> Anna Kontula and Tomi Kuhanen, “Rebuilding the Left Alliance - Hoping for a New Beginning”, in Birgit Daiber et al. 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32.

<sup>④</sup> Cornelia Hildebrandt, “DIE LINKE in Germany”, in Cornelia Hildebrandt and Birgit Daiber eds., *The Left in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Alliances Between Norway and Turkey*, Brussels: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09, pp.136-137.

<sup>⑤</sup> Stéphane Sahuc, “Left Parties in France”, in Birgit Daiber et al.eds.,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120.

治谱系的左边,隶属大左翼阵营。由于政党历史的渊源、政党纲领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支持这三类政党的选民也存在较高的重合性。本文基于政党基本政治定位,结合21世纪以来应对国内外条件变化而产生的政党变革和政策纲领的调整,分析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以及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与欧洲绿党的选民基础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年龄、性别、职业和学历构成的群体性特征。

在左翼政党阵营,社会民主党最初是通过动员工人阶级而组建的政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是其重要的奋斗目标。但在第二国际期间,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的政治分歧和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受十月革命及其之后革命浪潮的影响,各国革命左派纷纷与社会民主党母体相脱离,建立共产党。它们或是由社会民主党分裂而来,或是由分散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而形成,或是由社会民主党直接改名而来,并集合于共产国际与恢复后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相对立。<sup>①</sup>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尽管伯恩斯坦主张走和平民主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左翼政党中包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遭到强烈反对,但其观点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最终得到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多次对其理论进行调整。第一次调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该纲领虽认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并声明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人民的政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回应全球化挑战以及苏东剧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扩大政党的选举基础,欧洲社会民主党再次修正政党纲领与意识形态。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即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政党变革的最主要标志。它试图淡化阶级色彩和传统社会主义色彩,建立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协调“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潮。虽然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对公有制及其纲领进行了修正,如英国工党党章废除了第4条中的国有化目标,但在政治光谱中,它们依然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当前,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团结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价值观。<sup>②</sup>

在社会主义和激进政治传统较深的南欧地区,一些“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如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等依旧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激进特质。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南欧地区部分“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如西班牙联合左翼、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葡萄牙联合左翼等,包括西欧地区和北欧地区的很多

<sup>①</sup> 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sup>②</sup>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PES Fundamental Program*, June 2013, <http://www.pes.eu>, last accessed on 22 May 2017.

激进左翼政党,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普遍开始了去激进化和“民主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更趋近传统社会民主党的目标以及“新政治”。无论是更具有传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更富有现代性的民主左翼政党,激进左翼政党从整体上比社会民主党的定位更偏左,它们反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并提出通过计划经济和财富的再分配等实现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替代方案。由于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都与国内的社会民主党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因此,在选举竞争的零和博弈中,社会民主党无疑是激进左翼政党最大的竞争对手,因为二者具有较为一致的选民基础——工人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在很多南欧国家以及部分西欧国家,蓝领工人、失业群体等中下层民众是“传统”激进左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争夺的主要群体。而对于大部分北欧国家以及部分西欧和南欧国家的“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而言,它们不仅需要和社会民主党争夺中下层弱势群体,还需要争取新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欧洲各国的政坛中,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功超越社会民主党,成为国内最大的左翼政党外,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无论从选举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来看,都强于激进左翼政党,也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从德国 2013 年联邦大选的相关数据看(见表 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群体分布广泛,呈现“全民党”特征,有将近 20-30%的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失业者和退休人员支持社会民主党。而对于德国左翼党而言,白领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支持率明显低于两大主流中右和中左政党,蓝领工人和失业者是最主要的两大选民群体。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看,虽然激进左翼和社会民主党拥有社会平等的相同价值追求,但在如何实施特定的政策目标或者说解决社会分歧的社会方案方面却并不相同。相对而言,激进左翼更加忠诚于社会平等的社会目标。<sup>①</sup>在绝大多数国家,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比社会民主党坚守了更多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更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因而,也更容易吸引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群的支持。德国的案例表明,激进左翼政党若想成为更具影响力的主流政党,在固守传统选民阵地的基础上,也需要扩大在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率。

虽然,左右分野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没有减弱,但实证研究表明,民众的政治偏好正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单一维度向更加多元的议题领域转换,特别是对个人权利、身份认同、生态环境等后物质主义议题的关注,即赫伯特·基茨凯尔特(Herbert Kitschelt)所说的多维度政治议题空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绿党所代表的绿色新政治冲击着传统的政党竞争格局。生态可持续性、基层民主、社会主义与非

<sup>①</sup> Giorgos Charalambous and Iasonas Lamprianou, “The (non) Particularities of West European Radical left Party Supporters: Comparing Left Party Families”, pp.1-26.

暴力,是三十多年来欧洲绿党所立足的根本性原则。目前,除继续强调环境议题外,绿党也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政策议程,即在经济与社会议题上的左翼立场,以及在一系列社会议题上的自由主义立场。<sup>①</sup>虽然绿党一直试图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但它们通常被划入左翼政治阵营。在吸引白领阶层、年轻人等选民方面,绿党是激进左翼政党的直接竞争者。

为回应西方后物质主义语境下公众的绿色政治诉求以及欧洲绿党的政治竞争,部分北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自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即已开始吸纳绿色政治议题,转型成为“绿色替代”或“红绿”政党。冷战结束后,部分西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融合“红色”政治和“绿色”政治。当前,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福利国家等一样,已成为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核心政治目标之一。例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纲领中的五个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平等”、“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的自由”、“一个平等的挪威”和“全球正义”。<sup>②</sup>根据夏普尔希尔2010年的调查数据,欧洲绿党的成员普遍拥有较强的环境保护立场,环境定位的平均值在1-2之间。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2010年的夏普尔希尔专家调查数据看(见表3),大部分北欧激进左翼政党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瑞典左翼党、丹麦“红绿联盟”,以及部分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葡萄牙左翼联盟等,在“环境议题定位”得分上更接近于欧洲绿党,这些政党的环境议题重要性也相对较高。

在争取中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选民支持方面,激进左翼政党的竞争者不仅来自于社会民主党,还有绿党。欧洲绿党拥有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他们主要由“新中产阶级”所主导的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专家和学者等城市居民组成。其宗教信仰并不强烈、大多持有环保、自由主义或亲移民态度。<sup>③</sup>选举政治实力较强的绿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激进左翼政党在争取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选民方面的潜力。在北欧的芬兰、瑞典,虽然激进左翼政党很重视环境议题,但由于国内制度性因素、政党历史遗产和政党领袖等诸多因素影响,绿党在绿色议题上更具竞争力。例如,在芬兰的南部,绿党比左翼联盟更成功地代表了“新政治”,芬兰左翼联盟吸引了更多的蓝领

<sup>①</sup> Neil Carter, “Greening the Mainstream: Party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2, No.1, 2013, pp.73-94.

<sup>②</sup> Socialist Left Party (Norway), *Prinsipprogram for Sosialistisk Venstreparti*, Authorized by the National Congress, 27.03.2011.

<sup>③</sup> Martin Dolezal, “Exploring the Stabilization of a Political Force: The Social and Attitudinal Basis of Green Par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3, No.3, 2010, pp.534-552.

工人,特别是穷人等边缘化人群。<sup>①</sup> 在德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绿党与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竞争实力相当,甚至得票率超过激进左翼政党。(见表4)但在北欧的丹麦、挪威、冰岛以及南欧的希腊、葡萄牙、希腊等国,绿党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力相对较弱(见表4),这些国家的“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相对容易塑造“红绿”政党形象,吸引年轻人、白领阶层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支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绿党的生存空间。

表3 欧洲主要激进左翼政党“2010夏普尔希尔专家调查”得分

国家	政党	环境议题定位	环境议题重要性
丹麦	红绿联盟(EL)	0.9	8.4
挪威	社会主义左翼党(SV)	1.0	8.1
瑞典	左翼党(V)	1.9	7.0
芬兰	左翼联盟(VAS)	3.8	5.0
意大利	重建共产党(PRC)	1.6	7.0
葡萄牙	左翼联盟(BE)	2.0	4.8
西班牙	联合左翼(IU)	2.3	7.9
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0.8	8.8
希腊	共产党(KKE)	5.5	4.5
德国	左翼党(Linke)	4.2	5.4
法国	共产党(PCF)	5.0	3.1
荷兰	社会党(SP)	5.3	3.7

资料来源:2010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Ryan Bakker et al., “Measuring Party Positions in Europe: The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Trend File, 1999 -2010”, *Party Politics*, Vol.21, No.1, 2015, pp. 143-152.

注:1.环境议题定位:0=强烈支持环境保护;10=强烈支持经济增长;得分越低,说明该政党越支持绿色政治。2.环境议题重要性:0=一点都不重要;10=极其重要;得分越高,表明该党对环境议题重视度越高。

<sup>①</sup> Richard Dunphy, *Contesting Capitalism? Left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1.



表4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与欧洲绿党最近一次\* 大选得票率

国家	政党	得票率(%)	时间(年)
丹麦	红绿联盟	7.8	2015
	绿色替代	4.8	2015
挪威	社会主义左翼党	4.1	2013
	绿党	2.8	2013
瑞典	左翼党	5.7	2014
	绿党	6.9	2014
芬兰	左翼联盟	7.1	2015
	绿色联盟	8.5	2015
冰岛	左翼绿色运动	15.9	2016
葡萄牙	左翼联盟	10.2	2015
	民主团结联盟*	8.3	2015
西班牙	联合我们可以*	21.2	2016
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	35.5	2015(第二次大选)
	共产党	5.6	2015(第二次大选)
德国	左翼党	8.6	2013
	联盟90/绿党	8.4	2013
法国	左翼前线*	6.9	2012
	绿党	5.5	2012
荷兰	社会党	9.1	2017
	绿色左翼	9.1	2017

资料来源: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 2017年5月22日访问。

注:1.最近一次,指拥有数据的最新国内大选;2.葡萄牙“民主团结联盟”,指共产党与绿党的选举联盟;3.西班牙“联合我们可以”,指“我们可以”、联合左翼与绿党的选举联盟;4.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的两次大选中,希腊绿党(Ecological Greens)合并到“激进左翼联盟”参选,分别获得1和2个议席,在此前2007年、2009年和2012年的大选中,希腊绿党均进入议会;5.法国“左翼前线”,指法国共产党、一起党、左翼党的选举联盟。

#### 四 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极右翼政党之比较

反精英、反权威和反建制是民粹主义极为重要的特征,且容易被边缘化政党利用以对抗主流政治和权力。民粹主义现已成为极右翼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它

们通过制造精英与民众的对立而实现政治效能的最大化。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欧洲弱势群体或“现代化失意者”提供了表达不满、恐惧和愤怒的机会。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多数极右翼政党是当代工人阶层的政党,它们在吸引中低阶层、经济和社会福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现代化失意者”方面尤为成功。<sup>①</sup>也就是说,一些传统的左翼政党选民,如对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满的人群、蓝领工人、无技术的“无产阶级”和失业者都是极右翼政党的潜在选民。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瑞士的人民党,还是英国的国家党和人民党,都从工人阶层中获得大量支持。这意味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需要分享抗议者的角色,而两者之间的选民具有很高的重合性。

从表5的相关数据看,一些国家的“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比极右翼政党更依赖社会文化、技术领域和自由职业者人群的支持,大约占40%,而极右翼政党在此类群体中的支持率只有13%;另一方面,无论是丹麦的极右翼政党人民党,还是挪威的极右翼政党进步党,它们的选民群体中约有三分之二来自生产工人、服务业工人、职员等工人阶层,而“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这部分选民群体约占40%。

极右翼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工人阶层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新变化。正如西蒙·伯恩希尔(Simon Bornschieer)所指出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导致西方社会政治体制冲突性质的改变,而政治空间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双重转型产生了新的文化分野,工人阶级受到更多文化自由主义的熏陶,或倾向于支持建立在反对移民、反世俗主义和反建构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sup>②</sup>另一方面,外来移民的涌入,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而工人阶级中的失业者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就业的不安全感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使得一些蓝领工人更倾向于支持反移民态度的极右翼政党。<sup>③</sup>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工人阶层、低收入群体或者失业人群是基于不同原因支持极右翼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由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潜在威胁,后者则主要源于激进左翼的核心认同,即旨在实现社会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毋庸置疑的是,极右翼政党在蚕食主流政党选票的同时,也

<sup>①</sup> K. Arzheimer, “Electoral Sociology: Who Votes for the Extreme Right and Why—and When?”, in U. Backes and P. Moreau eds.,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Current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pp.35–50; 杨云珍:《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43页。[匈]安东·佩琳卡:“右翼民粹主义:概念与类型”,《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12–26页。

<sup>②</sup> Simon Bornschieer and Hanspeter Kriesi, “The Populist Right,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Class Politics”, in Jens Rydgren, *Class Politics and the Radical Right*, Routledge, 2012, pp.10–29.

<sup>③</sup> Marcel Lubbers, Mérove Gijssberts and Peer Scheepers,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1, No.3, 2002, pp.345–378.

给激进左翼政党带来挑战。面对一部分核心选民的流失和来自极右翼政党的激烈竞争,如何防止排外主义力量的崛起,如何有效地回应那些沮丧、迷失与不满的选民的经济和社会诉求,提供国内以及欧盟层面的政治替代方案,是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表5 丹麦和挪威: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选民的阶级构成(%)

国家	政党	小企业家	生产工人、服务业工人、职员	(副)经理	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由职业者
丹麦	社会主义人民党(SF)	3	41	16	40
	丹麦人民党(DF)	9	68	11	13
挪威	社会主义左翼党(SV)	3	41	15	41
	进步党(FRP)	6	67	10	13

数据来源:“European Social Survey”, <http://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 转引自 Daniel Oesch, “The Class Basis of the Cleavage between the New Left and the Radical Right: An Analysis for Austria, Denmark, Norway and Switzerland”, in J. Rydren ed., *Class Politics and the Radical Right*,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31-51。

注:社会主义人民党(SF)是丹麦的“红绿”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定位为激进左翼政党,加入欧洲议会的“欧洲联合左翼——北欧联合左翼党团”,但自90年代中后期该党在欧洲议会中加入欧洲绿党党团后,学界一般不再把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归为激进左翼政党。此处主要为说明激进右翼政党的选民构成。

## 五 结论

冷战结束后,在欧洲政党政治博弈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大部分国家政治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选举支持率上升,有的甚至实现了进入政府执政的目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关注,对中下层民众经济利益的关切是其获得相对稳定的选举支持的最重要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2008年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形势的恶化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提升了激进左翼政党争取中下层民众或传统工人阶级的动员潜力。正如上文所述,很多制度性因素影响了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结果,例如政党竞争因素。欧洲社会民主党、极右翼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空间,特别是在动员传统工人阶级、失业人群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方面,而来自

欧洲绿党的竞争也使得激进左翼政党在吸引年轻人和高学历的中产阶级方面相对困难。

当然,通过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群体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到,各国激进左翼政党的选民群体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北欧以及部分西欧、南欧“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根据选民偏好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渐淡化激进主义政治色彩,采取实用主义路线,“复制”和学习其他政党如欧洲绿党的议题,将其政策主张内化,从而实现自身政策战略的再调整,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努力扩展选民基础,特别是争取社会文化从业者、公共服务领域从业者等中产阶级和年轻人,是这些“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的主要策略。基于政党传统和历史、现实基础和政治空间的差异,对于“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而言,与极右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竞争无产阶级等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依然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重点。

限于篇幅,本文研究主要分析了外部的制度性因素如政党竞争,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政党政治发展和选举支持的影响,指出激进左翼政党在多维度的政治空间中维持和扩大选民基础的可能性以及面临的挑战。国际共产运动的曲折发展历史和21世纪以来各国激进左翼政党迥然不同的政党转型路径,导致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核心选民群体在不同国家、地域、政党层面的差异化,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内在一致性。而内部因素如政党历史、政党领导层、政党纲领与战略的变化如何影响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和政治走向,也是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

(作者简介:王聪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